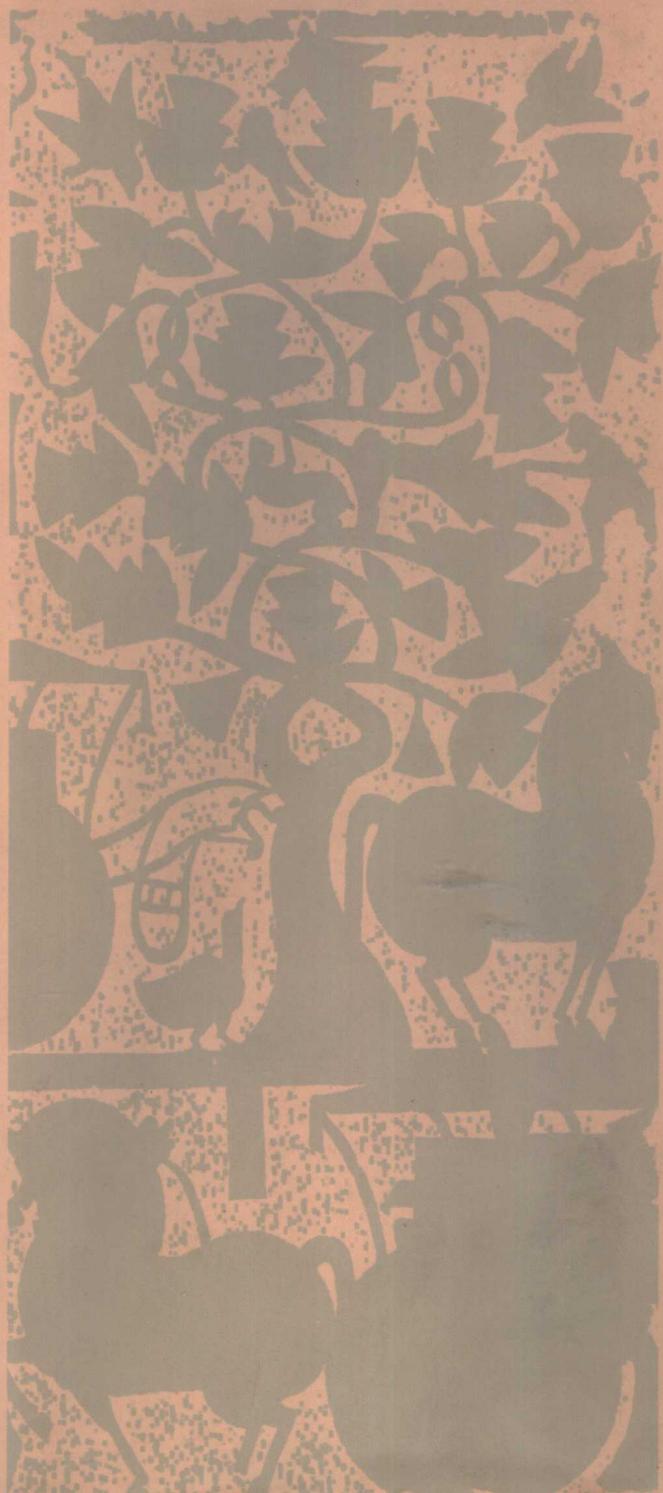


· 信立祥 著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Han Period Pictorial Stones

# 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

文物出版社



# 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

信立祥 著

文 物 出 版 社  
0036828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编辑：张庆玲

责任印制：王少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信立祥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8

ISBN 7-5010-1178-8

I . 汉… II . 信… III . 画像石 - 综合研究 - 中国  
- 汉代 IV . K87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6933 号

**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

信立祥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厂制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4 1/16 开 印张: 23

2000 年 8 月第一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178-8/K·483 定价: 120 元

2000.9.22

博文书社

No. 5527950

# 目 次

序 言 .....	俞伟超 (1)
第一章 汉画像石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4)
第二章 汉画像石的区域分布和产生的社会背景.....	(13)
第三章 汉画像石的艺术表现手法.....	(22)
第一节 汉画像石的制作过程.....	(22)
第二节 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	(27)
第三节 汉画像石的构图方式.....	(39)
1. 等距离散点透视构图法 .....	(47)
2. 焦点透视构图法 .....	(54)
第四节 汉画像石的画像题材分类.....	(59)
第四章 墓地祠堂画像石.....	(66)
第一节 墓地祠堂建筑及其画像的由来.....	(66)
第二节 祠堂后壁楼阁拜谒图的内容和意义.....	(83)
第三节 幽明两界的车马出行图.....	(102)
第四节 表现人间现实世界的画像.....	(118)
1. 历史故事画像 .....	(118)
2. 战争、狩猎及庖厨画像 .....	(129)
第五节 表现仙人世界和祠主升仙的图像.....	(143)
第六节 表现诸神天上世界内容的画像.....	(161)
小 结.....	(183)

第五章 地下墓室画像石	(190)
第一节 地下墓室画像石的由来	(190)
第二节 滥觞期的画像石墓及其画像	(198)
1. 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地区的早期画像石墓	(198)
2. 河南南阳和湖北北部地区的早期汉画像石墓	(222)
第三节 成熟期的墓室画像石	(229)
1. 成熟期画像石墓的墓葬形制	(229)
2. 成熟期墓室画像石的配置规律	(235)
3. 四川省的崖墓和石棺画像	(271)
小 结	(288)
第六章 石阙画像	(293)
第七章 墓室画像与祠、阙画像之间的关系	(322)
第一节 地下之“堂”与地上之“堂”	(322)
第二节 “都亭”、“驿”与祠堂的关系	(324)
第三节 河、桥以及桥上交战图的图像学意义	(328)
小 结	(334)
第八章 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的摩崖画像	(336)
第一节 道教人物画像	(338)
第二节 佛教内容画像	(345)
第三节 孔望山摩崖画像的雕造年代和性质	(348)
第九章 汉画像石各分布区间的交流和影响	(353)
结束语	(359)
后记	(362)

## 序　言

汉画像石是当时社会面貌的具体描绘，但却综合着政治制度、社会关系、生产能力、战争方式、道德观念、精神信仰以及艺术水平等各方面内容，被人们看作是汉代历史的画卷，对汉文化的研究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北宋末年，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著录了山东嘉祥武氏祠的榜题。南宋的洪适在《隶续》中又收录了武氏祠的部分图像摹本及更多的汉画像石榜题。以此为开端，汉代画像石成为金石学的研究内容。金石学的研究目的是“证经补史”，所以这种早期研究的重心是对其榜题内容的考释。但汉画像石既是一种画卷，仅用“证经补史”的方法来研究就远远不够。然而要跨越“证经补史”的局限再前进一步，尚有待于史学研究认识的提高。

等到这个时机出现，转眼间时间已过去了好几百年。19世纪中叶，对研究古代历史产生转折意义的考古学在欧洲诞生了。本世纪初，日本也开始了近代考古学研究。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本世纪初叶，法国的沙畹、色伽兰以及日本的关野贞等人，调查了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的汉画像石，刊印出了一些照相制版的勘察记录。从此，汉代画像石成为美术史和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并日益受到重视。新中国建立后，从50年代起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得到了巨大发展，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四川、山西、陕西、甘肃、云南、浙江等地，不断有汉画像石出土，其总数已达1万块以上。面对如此惊人的众多资料，要真正看懂其画像的内容，自然应先做好基础性的分类工作。于是，首先关心的就是以下这两个问题。

一是根据已发现的完整的墓室（含崖墓和石棺）、石祠堂、石阙上各类画像的分布位置，探索各类画像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一当在这方面得到了基本的规律性认识，就可以将各地所出大量的零散画像石组合成同一单位，复原其本来面貌。

二是对各地的汉代画像石进行分区和年代学研究，寻找出汉画像石的发展谱系。

此外，对画像内容的解释，当然也一直受到大家的关注；而且，以上三方面的工作当然也是同时和交错进行的。不过，如果从理解汉画像石的历史过程来说，弄清楚不同

画像内容的原来分布位置和分区以及年代问题，则一定是最具基础性的。

关于第一种研究，本世纪40年代时美国人费慰梅已经开始对武氏祠画像作了复原研究，80年代时蒋英炬更成功地完成了这项重要的研究；但大家都还来不及对各类画像石的原有布置规律作出全面研究和阐述。至于分区、分期研究，由于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中，这种方法要到80年代才真正成熟，在此以前，当然不会系统进行。信立祥君是在70年代至80年代之际开始研究汉画像石的。在当时，自然首先着重研究分区、分期问题；同时也注意到了汉画像石内容的组合问题。他从1979年开始，第一步是从四川、湖北开始，然后又至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以及山西、陕西等地，仔细观察了数千块汉代画像石，完成了《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一文，并因这篇论文而取得了北京大学1982年的硕士学位（此文1989年正式发表时，又经一定修改）。这是汉画像石研究史上第一篇系统研究，也是为其分区、分期研究打下可信基础的论文。此后，他继续以主要精力研究汉画像石，尤其是着重研究了汉代墓上石祠堂的画像、汉墓壁画、孔望山汉代东海庙址摩崖造像中的道教造像等问题，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后来，当其1994年至1996年在日本茨城大学讲学期间，又挤出时间，完成了《中国汉代画像石の研究》一书（1996年3月日本东京同成社出版），对汉画像石作了更全面的论述，并因此书而获得了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因其写作此书时还有讲课任务，时间比较紧迫，所以在近三年中，又对此书作了全面修改。如就汉画像石研究的专著而言，现在完成的全稿，无疑是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本。如就汉画像石的研究历程来说，则正反映了本世纪以来关于汉画像石内容分类及其在同一单位内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关于分区、分期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

具体的科学的研究，离不开科学整体研究水平的制约。今天，考古学研究的整体研究水平，早已从分类阶段进入到解释阶段；对考古学遗物的研究，其重心也已从物质文化领域的说明逐渐向探讨精神形态领域转移。在汉代考古的研究中，近年来也慢慢认识到两汉文化之所以发生阶段性的变化，除了生产能力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外，意识形态的变化是至关紧要的。汉画像石产生于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得到迅速发展，东汉中期以后达到其繁盛期。这一历史现象与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倡的儒家思想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地位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这是汉画像石出现和日益发达的根本原因。东汉中期以后，道教及当时还依附于道教的佛教信仰也迅速发展起来，汉画像石及同时期的墓室壁画中表现这种信仰的内容，也相应扩大。但这种变化的线索虽已清楚，具体的阐述却还很不够。这肯定将是以后会着重探讨的内容。

1995年11月6日，在日文版《中国汉代画像石の研究》出版前不久，我曾为该书

写了一个短序。现在此书又将出版，我又写了这个序言，并特意写了上面的最后一段话，无非是希望信立祥君和其他热心于研究汉代画像的学者在今后能加重探讨汉画像中隐藏的精神世界。这可能是最难寻找的，但这恰恰是汉画像的灵魂！

俞伟超

1999年7月30日凌晨于北京小石桥寓所

# 第一章 汉画像石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所谓汉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其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在本质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中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sup>①</sup>，当时社会上最优秀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通常都首先用于祭祀和战争。就这点来说，汉画像石无疑应是汉代美术艺术的精华。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从西汉晚期到东汉末，伴随着疯狂涌动的厚葬风潮，汉画像石在社会上流行了近三个世纪之久。主要由画像石、画像砖和墓室壁画所代表的汉代美术，不仅是汉以前中国古典艺术发展的巅峰，而且对汉以后的艺术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汉画像石，不仅分布地域广，发现数量大，而且艺术成就巨大。它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生动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妙趣横生地描绘了汉代人的鬼神信仰和理想追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美术史上，汉画像石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是一部精深博大的史诗。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汉画像石作为研究汉代历史和中国古代美术史的第一手资料越来越为学界所珍重。

汉画像石的发现和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金石学阶段，时间上大体从北宋末年到本世纪初。作为一种明显的地理标志，矗立在墓地中的汉代石祠及其画像，最先受到战争史家和地理学家的注视。东晋末年，戴延之在《西征记》中首次记载了今山东地区鲁恭（按此字应为峻，据碑文，鲁峻卒于汉灵帝熹平元年，葬于熹平二年）墓前的石祠、石庙及其画像，称其画像内容有“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象”，像旁有铭刻题榜<sup>②</sup>。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汉画像石的最早记载。北魏末年，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述了今山东、南阳等地李刚、鲁峻、胡著等人的石祠及其画像<sup>③</sup>。但这些石祠及其画像，都是作者在记述水道和地理形势时作为地理标志而写进著作中的。汉代墓室画像石的著录，最早见于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年）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该书卷十九有一段关于朱鲔墓石刻画像的记述：“济州金乡县发一古冢，乃汉大司徒朱鲔墓。石壁皆刻人物、祭

器、乐器之类。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头者，巾额皆方，悉如今制，但无角耳。妇人亦有如今之者，如近年所服角冠，两翼包而下垂及肩，略无小翼。人情不相远，千余年冠服已常如此。其祭器亦有类今之食器者。”语虽简约，但从其对画像细部把握的准确和古今比较时语气的肯定来看，沈括很可能实地观察过该墓的画像石，至少曾仔细观看过该墓画像石的拓片。大约与此同时，著名书画家米芾在《画史·唐画》中也记载了朱浮（疑为朱鲔）墓的车马出行图及其铭刻题榜。但这两则关于汉代墓室画像石的记述都是缘事而发，并非学术性著录。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一些金石学家开始有目的地收集和著录汉画像石。北宋末年，金石学家赵明诚“访求藏蓄凡二十年”，积累了大量金石铭刻拓片资料，苦心玩味探索，著成《金石录》一书。全书共三十卷，前十卷为目录，以时代为序，注明藏品的年月及撰书者姓名；后二十卷为跋尾，对藏品进行评论和考订。从书中所记，可知赵明诚收藏了不少汉画像石拓片。其中目录第二百三十九至二百四十三号为“武氏石室画像”一至五卷。卷十九“武氏石室画像”条下跋尾云：“右汉武氏石室画像五卷。武氏有数墓，皆在今济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圣贤画像，小字八分书题记姓名，往往为赞其上，文辞古雅，字画遒劲可喜，故尽录之，以资博览。”这是有关武氏祠画像的最早著录。由于该书对画像石的记述过于简略，使读者很难通过其描述了解画像的具体内容。从书中对画像石的评述可以看出，主观欣赏的比重远远大于客观研究。真正意义上的汉画像石著述，始于南宋洪适的《隶释》及其序篇《隶续》。成书于乾道二年（1166年）的《隶释》一书，不仅收录了比《金石录》更多的汉画像石的题榜刻铭，而且增加了对画像内容的描述和简单的考证。如在卷十六的“武梁祠画像”条云：“右武梁祠画像为石六，其五则分为二，梁高行、蔺相如二段又广于他石。所画者古帝王、忠臣、义士、孝子、贤妇，各以小字识其旁，有为之赞文者。其事则《史记》、两汉史、《列女传》诸书，合百六十有二人，有标题者八十七人，其十一人磨消不可辨，又有鸟兽、草木、车盖、器皿、屋宇之属甚众。”稍后成书的《隶续》卷五、卷六，收录摹写了包括武氏祠在内的山东、四川等地的许多石祠、碑、阙上的画像，在汉画像石研究中首开编辑出版图录的先例。元明时期，学术废弛，金石学日衰，汉画像石似被遗忘，有关著作寥若晨星。进入清代以后，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金石学也走向复兴之路，这为汉画像石的发现与研究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和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金石学家黄易和李克正分别对已被洪水淤积湮埋达数百年之久的武氏祠石刻群进行了发掘，使这批久负盛名的石刻画像重见天日<sup>④</sup>，在学术界再次激起了著录和研究汉画像石的热潮。以这两次发掘为开端，著录和研究汉画像石的金石学著作不断问世，到本世纪初，总数不下数百种。较重要的有黄易的《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王昶的《金石萃编》、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毕沅和阮元的《山左金石志》、

冯云鹏和冯云鹏兄弟的《石索》、瞿中溶的《汉武梁祠画像考》、方朔的《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刘喜海的《金石苑》、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端方的《陶斋藏石记》等。一些地方志也在金石目中著录了当地发现的汉画像石。

概括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资料主要来自未经科学调查和发掘的零散画像石，大多学者甚至只以收集的拓片为依据，因此研究资料几乎全部是地面上散存的石祠、碑、阙的画像，墓室画像石资料几近于无；二是著录和研究偏重题榜铭刻文字和历史故事画像内容的考证，对大量无文字题榜的画像石则很少加以注意。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使金石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对汉画像石作全面的、科学的考察。不过，在汉画像石题材内容、特别是历史故事画像内容的考证方面，不乏精辟之作，如冯氏兄弟和瞿中溶的著作，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第二个阶段约从本世纪初到 60 年代，这是一个用近代考古学方法积累汉画像石资料的阶段。

1907 年，法国考古学家沙畹<sup>⑤</sup>和日本古建筑学家关野贞<sup>⑥</sup>分别调查了山东、河南等地的汉代石祠、石阙及其画像，并出版了印制精美的图录；1914 年，法国考古学家色伽兰等人调查了四川嘉陵江和岷江流域的汉代崖墓、石阙及其画像。调查中，他们用近代考古学方法进行了测量和记录，使汉画像石的研究开始走出了金石学家的书斋，进入到考古科学的庭院。1933 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主持发掘了山东滕县的一座大型画像石墓——传曹王墓<sup>⑦</sup>。与此同时，河南南阳地区的汉画像石也引起了文化界人士的关注。1930 年和 1937 年，关百益和孙文青相继出版了《南阳汉画像集》<sup>⑧</sup>、《南阳汉画像汇存》<sup>⑨</sup>，两书共刊布了 100 余幅南阳汉画像石拓片，使南阳汉画像石的风貌开始为世人所知。抗日战争期间，撤往四川的原中央研究院和中国营造学社的部分学者，分别调查了四川的彭山、乐山和重庆附近的汉代画像石阙及画像崖墓。50 年代初，傅惜华集中了大量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拓片，编辑出版了《汉代画像全集》初编（1950 年）、二编（1951 年）。但直到此时，汉画像石资料的积累还主要是通过调查和捶拓进行的，唯一的一次汉画像石墓的科学发掘，也因资料的丢失而至今没有发表报告<sup>⑩</sup>。

汉画像石的发现和介绍，激发了国内外文化界人士收集和研究汉画像石的极大兴趣，也引发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和贪婪的古董商人占有和掠卖汉画像石的欲望，致使不少汉画像石流失到国外。例如，1919 年，山西离石马茂庄发现的东汉和平元年左元异墓画像石出土后不久，就被卖到国外<sup>⑪</sup>。目前，在日本的国立东京博物馆、天理参考馆、白鹤美术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院，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和加拿大的一些博物馆都收藏着不少汉画像石。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也是汉画像石的热心收集者和宣传者。从民国初年起，鲁迅先生就已开始收集山东地区的汉画像

石拓片，至 20 年代末，已积累了相当数量。南阳汉画像石的最早图录问世后，引起了鲁迅先生的极大兴趣，曾先后多次致函友人托为代购拓片，总数达 200 余幅。他认为，这种深沉雄大的汉代石刻画，是发展和提高木刻版画艺术的最好借鉴。他说，“我已确切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护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sup>⑫</sup>。鲁迅先生曾计划将收集的汉画像石拓片精品整理出版，可惜因先生于 1936 年突然逝世，使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汉画像石资料的积累进入到以科学发掘为手段的时期。1954 年山东省沂南县北寨村大型汉画像石墓<sup>⑬</sup>的发掘，为这一时期揭开了序幕，使汉画像石的调查、发掘和研究，越来越成为汉代考古的重要内容。到 60 年代中期止，在山东、苏北、皖北地区，发掘了安丘牟山、福山东留公村、章丘普集镇、睢宁九女墩、铜山的洪楼和茅村、东海昌黎水库、定远坝王庄等处的 20 多座汉画像石墓；在河南南阳地区，发掘了杨官寺、七里园、襄城茨沟等重要汉画像石墓；在四川的重庆、合川、宜宾、乐山、新津、彭山、成都等地，也调查发掘了相当数量的汉画像崖墓和汉画像石墓，出土了一些有价值的画像石棺；在陕北的绥德、米脂、榆林等地，新发现了一大批汉画像石墓，证明了这里是汉画像石的一个重要分布区。

研究方法亦已不再是简单地著录图像或孤立地进行画像题材内容的考证，而是将汉画像石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力图从整体上加以考察。最初，沙畹和关野贞结合汉代丧葬礼制、建筑形制对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石祠、石阙及其画像所做的研究，美国的费慰梅<sup>⑭</sup>及日本的秋山进午<sup>⑮</sup>对武氏祠复原的构想，都对汉画像石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在艺术史方面，自日本的大村西崖在《支那美术史雕塑篇》<sup>⑯</sup>中第一次对汉画像石进行详细介绍后，汉画像石日益成为汉代美术史的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在汉画像石本身的研究中，金石学家所忽视的画像雕刻技法此时得到充分重视。沙畹和关野贞是最早对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30 年代，滕固在《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sup>⑰</sup>一文中，把雕刻技法的分析提到了首位，认为雕刻技法是决定汉画像石艺术风格的最主要的因素。他通过与希腊、罗马石刻艺术的对比，把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归纳为“拟绘画的”和“拟浮雕的”两大类。这一分类原则，至今仍未失去意义。

此期间内，研究汉画像石的金石学著作，也间有佳作问世，最著名的当首推容庚于 1936 年出版的《汉武梁祠画像考释》<sup>⑱</sup>。该书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武梁祠画像石的发现始末、著录研究和拓片流传，并对画像内容进行了详细考证。作者在讨论武梁祠画像的雕刻技法时深刻指出：“欧洲绘画，重在外物之精密观察，其阴阳向背之影，以渲染显之；吾国绘画，重在领会动植物之内在精神，而不求之迹象，其显露物象，乃以线条而不以阴影。观于武梁祠画像，可知吾国画法之所从出。”在汉画像石的研究史上，这是第一次对我国与欧洲美术艺术的异同所作的精辟概括。

但这一阶段的研究，忽视了对社会关系的注意，对汉画像石本身的发展序列、同一建筑内不同内容画像之间联系、特别是墓室画像与祠堂画像之间的有机联系还没有给以注意。因此，这一阶段只能被认为是一个资料的积累阶段。不过，通过这一阶段的研究，汉画像石的地域分布及其雕刻技法、艺术风格特点已被大体搞清，从而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 60 年代中期起，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汉画像石的研究进入到第三阶段，即综合研究阶段。

早在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考古学研究已开始注意了对隐藏在考古资料背后的社会关系的考察，并注意了考古资料所反映出的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阶段性。这也正是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和分期断代研究的课题。正是在这种学术思想背景下，考古界开始了汉画像石分区与分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汉画像石的各个研究领域，诸如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图像内容的解释和考证、图像的配置规律、各类题材内容画像之间的联系，汉画像石所反映出的汉代礼制、风俗、宗教信仰、汉画像石所属建筑的复原等专项研究也相继展开，汉画像石研究出现了一个佳作不断、异彩纷呈的新局面。

大量新的考古发现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在河南南阳、鄂北地区，发掘了当阳刘家冢子，邓县长冢店，南阳军帐营、石桥、王寨，唐河电厂、针织厂，方城东关等地点的三十余座汉画像石墓，特别是南阳赵寨<sup>⑩</sup>和唐河石灰窑村墓<sup>⑪</sup>的发掘，把这一地区汉画像石的出现时间上推到西汉晚期，大大改变了对这一问题的传统看法。在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地区，发掘了诸城、泰安、嘉祥、肥城、枣庄、阳谷、济南、平邑、微山、滕县、苍山、徐州、铜山、新沂、邳县、赣榆、泗洪、永城、亳县和褚兰等地的四十余座汉画像石墓，其中山东临沂庆云山<sup>⑫</sup>、平阴新屯<sup>⑬</sup>，江苏徐州万寨<sup>⑭</sup>、沛县栖山<sup>⑮</sup>、连云港锦屏山桃花洞<sup>⑯</sup>，河南夏邑吴庄<sup>⑰</sup>等地点的多座小型画像石椁墓的发掘，亦将这一地区汉画像石的起源时间追溯到西汉晚期。此外，连云港市孔望山汉代摩崖造像群佛、道教内容的认定，为了解汉画像石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增加了重要资料<sup>⑱</sup>。在陕北的绥德、米脂、子州、神木和晋西地区的离石等地点，也发掘了一批汉画像石墓，其中神木大保当汉画像石墓群<sup>⑲</sup>出土的一大批画像石，色彩鲜丽如新，是研究汉画像石制作工艺的绝好资料。在四川的宜宾、成都、内江、简阳、彭山、合川和郫县等地点，也发掘了一批汉画像石墓和汉代画像崖墓，得到了一批有研究价值的画像石棺。值得注意的是，在江南的浙江海宁、江苏苏州和镇江等地点，相继发现了一些汉画像石墓，使我们对汉画像石的地域分布有了新的认识。而汉代考古的一些重要新发现，如湖南长沙马王堆 1 号、3 号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出土的彩绘漆棺及帛画，河南洛阳卜千秋墓的壁画配置，都为探讨汉画像石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汉画像石资料的出版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仅报刊杂志上有关汉画像石的发掘报告和简报的数

量不断增加，而且各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区如山东、徐州、南阳、陕北都出版了印制精美的汉画像石图录，四川的石棺画像、汉阙画像，河南登封三阙画像，山东武氏祠画像和安丘画像石墓也都出版了专集。这一切，都有力地促进了汉画像石研究工作的开展。

从1965年开始，山东、徐州、河南的考古工作者先后著文对这些地区的汉画像石的分布、雕刻技法、艺术风格、题材内容等方面的特点和分期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蒋英炬、吴文祺对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产生条件、雕刻技法、分期所作的分析，代表了这一阶段研究的新水平<sup>⑨</sup>。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关于山东苍山元嘉元年汉画像石墓年代问题的讨论。在报告作者把墓的年代误定为刘宋时代以后，考古界同行纷纷著文加以纠正，说明在汉画像石的断代研究方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恢复零散汉画像石的本来面目方面，蒋英炬和吴文祺对武氏祠所作的科学复原<sup>⑩</sup>，使这批久负盛名的零散祠堂画像石变成了较完整的科学资料；而蒋英炬利用嘉祥出土的零散画像石对小祠堂的复原<sup>⑪</sup>，使我们对汉代墓上祠堂的形制有了新的认识。

与此同时，国外学者也作了许多研究。1965年出版的、由日本的长广敏雄主编的《汉代画像的研究》<sup>⑫</sup>一书，是最早的一部对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墓室壁画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专著，它的问世，宣告了汉画像石研究新阶段的到来。该书收录的德国学者库劳瓦森从透视学角度分析武梁祠画像构图特点的论文，是一篇立意新颖的佳作。1974年，长广敏雄出版了《南阳的画像石》<sup>⑬</sup>一书，从题材内容、雕刻技法到艺术风格，对南阳地区汉画像石作了较全面的分析。1986年，日本学者土居淑子出版了汉画像石综合研究力作《古代中国的画像石》<sup>⑭</sup>，对汉画像石的构图以及五行思想对画像内容的影响作了精辟阐述。各项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1966年，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发表了《东汉时期的车马行列》<sup>⑮</sup>一文，根据汉画像石和汉画像砖中的大量车马出行图，对汉代的车舆等级制度进行了探讨。这一研究，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汉画像石研究的范畴而进入到社会史研究的领域。1974年，林巳奈夫发表了题为《汉代的鬼神世界》<sup>⑯</sup>的论文，第一次对汉画像石中的鬼神信仰内容作了系统的考察，这是迄今所见最精彩的汉画像石研究论文。另一位日本学者曾布川宽先后发表了《昆仑山与升仙图》<sup>⑰</sup>（1979年）、《向昆仑山的升仙》<sup>⑱</sup>（1981年）、《汉代画像石中的升仙图谱系》<sup>⑲</sup>（1993年）等著名论文，对汉画像石中升仙内容图像的由来、产生和发展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1991年，日本学者佐原康夫在《汉代祠堂画像考》<sup>⑳</sup>一文中，对汉代墓上祠堂的性质、画像内容及其配置作了考察。1989年，中国学者巫鸿在美国用英文发表了《武梁祠研究——中国早期的绘画艺术观念》<sup>㉑</sup>一书，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汉画像石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例如，对各区域画像石之间的交流及影响还很少有人加以注意和研究；在对汉画像石中的升仙图像进行考察时，由于忽视了汉代礼制对画像内容的影响和

不同画像内容之间特别是墓室画像与祠堂画像之间的有机联系，有时将明显是表现祭祀场面的车马出行图也看成墓主升仙图。显然，要进一步将汉画像石研究工作推向深入，就必须克服这些研究上的缺陷。

笔者从事汉画像石研究始于1979年。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由俞伟超先生指导读硕士研究生课程。本来，最初的研究课题是“汉代墓葬所反映的社会等级制度”。当年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随俞伟超先生考察了四川乐山的麻浩崖墓和柿子湾崖墓，深深为其宏大的气势和精美的石刻画像所打动。回校后，经俞伟超先生同意，决定将研究课题改为“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为了完成课题研究，自1979年至1982年，我相继考察了四川、河南、山东、苏北、湖北、皖北和陕北地区的汉画像石，并在俞伟超先生指导下写成了《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sup>②</sup>一文。使我极为感动的是，在论文答辩时，已多年卧病在家的阎文儒教授看了我的论文，不顾劝阻，坚持拄杖参加论文答辩会，他不是答辩委员，却用左手艰难地写了评语。在答辩会上，他用黯然神伤的口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希望你继续深入研究这个课题，将来写出一部专著。可惜，我可能活不到那一天了。”正是阎文儒先生的这一殷切嘱托，使我始终没有放弃汉画像石研究这一课题。近二十年来，我先后观察了四川省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南阳汉画馆、徐州汉画馆、连云港市博物馆、陕西省考古所以及山东邹县、滕县、嘉祥、济宁、益都、蓬莱、福山、青岛和安徽亳县等地文物部门收藏的三千块以上的零散画像石，还实地观察了四川乐山的汉画像崖墓，河南唐河的冯孺久墓、针织厂墓、南阳的中原机械学校墓、密县打虎亭墓、著名的登封三阙，江苏铜山茅村墓，山东安丘墓、嘉祥武氏祠石刻群和安徽亳县董园村2号墓等墓、阙上的石刻画像，调查和实测了四川乐山麻濠崖墓、柿子湾崖墓，江苏邳县燕子埠缪宇墓、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群，安徽宿县褚兰墓和山东长清孝堂山祠堂等汉代画像石墓、祠堂和摩崖造像。在较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我分专题对汉画像石进行了研究，先后发表了《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sup>③</sup>（与俞伟超先生合写）、《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的道教人物考》<sup>④</sup>、《论汉代的墓上祠堂及其画像》<sup>⑤</sup>、《汉代画像中的车马出行图考》<sup>⑥</sup>等论文，为进一步的综合研究作了准备。

1994年至1996年，我应邀赴日本国立茨城大学讲授中国考古学，开设了汉代美术考古专题课，汉画像石是我讲授的重要内容。为此，我集中精力对汉画像石进行了综合研究。在我的挚友、茨城大学教授茂木雅博先生的建议、帮助和支持下，我用日文将研究成果写成《中国汉代画像石の研究》一书，1996年3月，由东京同成社出版。本来，原计划全书共写九章，由于交稿时间的限制，不得不压缩成七章，并删减了部分章节的内容。该书出版后，不少友人建议我在中文版中充实日文版被删减压缩的内容，全璧以飨读者，而这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本书就是为了实现友人的嘱托和我个人的愿望而写成的。书中不仅新增了摩崖造像和石阙画像等章节，其他章节也充实了大量新的内容，部分章节是重新构写的。这是我二十年来对汉画像石进行综合研究的总结。在研究中，我采用了图像学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的方法。但过分拘泥图像学方法，容易导致违反科学的联想和演绎，使图像的解释脱离历史的实际；而过分强调文献史料的作用，则容易忽视画像间的有机联系，导致对图像内容牵强附会的解释。在研究中，我虽然力求避免这两种矫枉过正的倾向，但由于个人学力所限，失误和偏颇在所难免，这只能祈请方家哂正了。我想，本书的出版，或可慰阎文儒先生在天之灵，也可以向期待本书早日问世的师友作个交代了。

### 注 释

- ① 《左传·成公十三年》。
- ② 见《水经注》济水条引文。
- ③ 《水经注》济水、比水条。
- ④ 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
- ⑤ Chvannes Eaouard, la sculptu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 Paris, 1893; Chvannes Eaouard, Missiou archeoeogi gus dons ea china septentrionale, Paris, 1909; Chvannes Eaouard, Les documente chino is decouuverts par Auurel st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
- ⑥ 关野贞：《支那山东省における漢代墳墓の表飾》，1916 年，东京；关野贞：《支那の建築と藝術》，岩波书店，1933 年。
- ⑦ 董作宾：《山东滕县曹王墓汉画像残石》，《大陆杂志》第 21 卷 12 期，1960 年。
- ⑧ 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中华书局，1930 年。
- ⑨ 孙文青：《南阳汉画像汇存》，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1937 年。
- ⑩ 同注⑦。
- ⑪ 谢国桢：《跋左元异墓石陶片拓本》，《文物》1979 年 11 期；高维德：《左元异墓汉画像石浅析》，《汉代画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 年；梁宗和：《山西离石县的汉代画像石》，《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 4 期；卫聚贤：《汉左表墓石画说明书》，《说文》第一卷 456 页。
- ⑫ 鲁迅：《引玉集·后记》，《鲁迅全集》第 4 卷 60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
- ⑬ 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 年。
- ⑭ 费慰梅：《汉“武梁祠”建筑原形考》（王世襄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7 卷第 2 期。
- ⑮ 秋山进午：《武氏祠堂復原の再検討》，《史林》1963 年 6 期。
- ⑯ 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16 年。
- ⑰ 滕固：《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载《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 年。
- ⑱ 容庚：《汉武梁祠画像考释》，燕京大学考古社，1932 年。
- ⑲ 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县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 年 1 期。
- ⑳ 南阳地区文物队赵成甫、张逢酉，唐河县文化馆平春照：《河南唐河石灰窑村画像石墓》，《文物》1982 年 5 期。

- ② 临沂市博物馆：《临沂的西汉瓮棺、砖棺、石棺墓》，《文物》1988年10期。
- ②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平阴县博物馆筹建处：《山东平阴新屯画像石墓》，《考古》1988年11期。
- ② 徐州市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6页，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
- ② 徐州市博物馆、沛县文化馆：《江苏沛县栖山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考古学集刊》第二卷，1982年。
- ② 李洪甫：《连云港锦屏山汉画像石墓》，《考古》1983年10期。
- ③ 商丘地区文化局：《河南夏邑吴庄石椁墓》，《中原文物》1990年1期。
- ② 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文物》1981年7期；俞伟超、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文物》1981年7期；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的道教人物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2期。
-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神木大保当第11号、第23号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9期。
- ② 蒋英炬、吴文祺：《试论山东汉画像石的分布、刻法与分期》，《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
- ③ 蒋英炬、吴文祺：《武氏祠画像配置考》，《考古学报》1981年2期。
- ③ 蒋英炬：《汉代的小祠堂》，《考古》1983年8期。
- ③ 长广敏雄：《漢代画像の研究》，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65年。
- ③ 长广敏雄：《南陽の画像石》，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1974年。
- ④ 土居淑子：《古代中国の画像石》，同朋舍出版，1986年。
- ⑤ 林巳奈夫：《後漢時代の車馬行列》，《东方学报》京都版第37册，1966年。
- ⑤ 林巳奈夫：《漢代鬼神の世界》，《东方学报》京都版第46册，1974年。
- ⑦ 曾布川宽：《昆侖山と昇仙図》，《东方学报》京都版第51册，1979年。
- ⑤ 曾布川宽：《昆侖山への昇仙》，中央公论社，1981年。
- ⑨ 曾布川宽：《漢代画像石における昇仙図の系譜》，《东方学报》京都版第65册，1993年。
- ⑩ 佐原康夫：《漢代祠堂画像考》，《东方学报》京都版第63册，1991年。
- ⑪ Wu Hung: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⑫ 信立祥：《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载俞伟超编《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
- ⑬ 俞伟超、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文物》1981年7期。
- ⑭ 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的道教人物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2期。
- ⑮ 信立祥：《论汉代的墓上祠堂及其画像》，载《汉代画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年。
- ⑯ 信立祥：《汉代画像中的车马出行图考》，《东南文化》1999年1期。